

欧阳修文集版本流传系统辨析

王岚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充馆阁校勘。三年，降夷陵令，移乾德。康定元年（1040）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1054）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1067）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1068）徙青州、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于颍州汝阴，年六十六。谥曰文忠。著《新唐书》、《新五代史》、《欧阳文忠公集》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文坛盟主，他成功地领导了第二次古文运动，识拔举荐了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二子轼、辙等人，扭转了西昆体骈俪文风，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同时他又以自己丰富的创作，成为散文大家、四六能手，诗歌则与梅尧臣齐名。

庆历三年（1043）四月，欧阳修入谏院；十二月，官拜右正言、知制诰；至四年秋，出为河北转运使。在掌诰命、兼谏职期间，他经常上殿奏对，退而草撰制书。五年春，权知成德军，闲来无事，遂整理先前所作制草，共有一百五十余篇，重新誊录，编为三卷并撰序文，是为《外制集》（《四部丛刊》初编本《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三《居士集》卷四三《外制集序》，简称本集）。

欧阳修初调洛阳从事时曾著《牡丹谱》3篇一卷，品评洛阳牡丹之花品高下（《郡斋读书志》^①衢本卷一二）。今本《外集》卷二二有《牡丹记》3篇，且有欧阳修跋尾，撰于熙宁元年（1068）。后来无名氏集欧阳修等诸家牡丹谱、芍药谱，共为《牡丹芍药花品》七卷（《直斋书录解題》^②卷一〇）。

《唐书》二百卷，五代后晋刘昫等纂。宋仁宗时曾公亮等被诏删定《新唐书》，庆历四年（1044）开局，欧阳修负责撰纪、志，宋祁撰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等同编修，成二二五卷，嘉祐五年（1060）奏上之，较《旧唐书》事增文省（《郡斋》卷五、《直斋》卷四）。

欧阳修从至和元年（1054）到嘉祐五年（1060）在翰林前后达六年之久，当值之日所撰制书，总数多达四百余篇。嘉祐六年八月欧阳修重览旧稿，编为《内制集》并撰序（本集卷四三《居士集》卷四三《内制集序》）。

欧阳修喜欢收集历代的金石碑帖，也曾经为其众多的藏品撰写跋尾。他编的《集古录》共达千卷，每卷碑文拓本在前，跋文在后，并钤有其名印，“褱以绁纸，束以缥带”，精加装潢，书签上还有其亲题书写的“某碑卷第几”真迹（本集卷一四三《集古录跋尾》卷一〇校勘记）。且《集古录》各卷是随所得而录之，并非按照碑文时代先后。另外欧阳修还想将诸藏品“撮其大要，别为《录目》”，着重记载一些能够订正史传缺漏错谬的金石文字，使之传于后学益于多闻（本集卷一三四《集古录目序》），也就是撰写跋尾。在嘉祐四年（1059）之前欧阳修已经写成了八九十篇（本集卷一四八《书简》卷五《与刘侍读原父》第二书），并在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撰有《集古录目序》。《集古录》编成八年之后，欧阳修又命其子欧阳棐（字叔弼）根据千卷的《集古录》，“各取其书撰之人事迹之始终，所立之时世而著之”，编纂了《集古目录》（又作录目）十卷，“以附于《跋尾》之后”，欧阳棐本人在

^① 简称《郡斋》。

^② 简称《直斋》。

熙宁二年（1069）亦有记（本集卷一三四《录目记》）。

关于《集古录目》到底是欧阳修自撰（《集古录目序》），还是命欧阳棐代成（《录目记》）？是十卷（《录目记》），还是二十卷（《直斋》卷八、《集古录跋尾》卷一〇校勘记）？《集古录跋尾》所收跋文数目究竟有几百篇？这些是宋人都深感疑惑的问题，故庆元本才将欧阳棐《录目记》附在了欧阳修《集古录目序》后面，以相参照。据我们推测，嘉祐末欧阳修所撰的《集古录目序》，其实是为其《集古录》而作的，但《集古录》有千卷之巨，不便流传，故当时他很想撮其要，编一部简明的《录目》，“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即《录目》既是《集古录》的要目，同时还收有跋尾文字。不过，若干年后当欧阳修写出了296篇跋尾时，他原先设想的纲要性质的“目录”部分却没有闲暇完成，欧阳修遂嘱托儿子欧阳棐代为编纂。欧阳棐于是从千卷的《集古录》中摘出有关书撰之人姓名事迹时代等内容，编成十卷，附于跋尾之后。也就是说欧阳修最初想编的《集古录目》是包括“集古录目录”和“集古录跋尾”两部分内容的，但在实际编撰过程中他集中精力总共写成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而难度又较大的四百余篇跋尾，而将简单的记录碑石所在及其撰书者名氏岁月的列目工作交给儿子欧阳棐去完成，欧阳棐遂编成了十卷的《集古（录）目录》。

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与欧阳棐的《集古目录》在社会上都有单行刻本，《跋尾》收录的篇数多寡有不同的记载：欧阳棐撰《录目记》时见到的是“二百九十六篇”（当为稿本）；南宋绍熙、庆元间周必大等校刻欧集时所见通行的《集古跋》刻本是十卷，四百余篇；他们还得到了绍熙时知府方松卿刊刻于庐陵的欧公跋尾真迹，所收为二百四十余篇，且与“集本”（当指《集古跋》单行刻本）文字差异较大（《集古录跋尾》卷一〇校勘记）。而陈振孙（1183—1249）见到《集古目录》二十卷时谓“今考集中凡三百五十余篇”（《直斋》卷八），这里的“集”当指通行的欧阳修文集。另外《宋史》卷二〇二《艺文一》著录的《集古录跋尾》一本六卷，一本二卷；又在卷二〇四《艺文三》著录有《集古录》五卷。

《目录》起初也是十卷，附于《跋尾》之后，后经书商改编刊刻，变成了二十卷。大约于元代散逸。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缪荃孙据《宝刻丛编》、《隶释》、《舆地纪胜·碑目》校辑欧阳棐《集古录目》，编成十卷，收入《云自在龕丛书》第一集刊行。辑本《集古录目》的格式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碑石按照朝代先后编次，起于秦《祀巫咸文》，止于宋《睦州大厅记》，碑名之下简单说明其字数、字体、碑文、刻石人、刻石年月、刻石地点等，并注辑佚出处。缪荃孙在该本卷末作跋（撰于光绪十年），称“重加搜辑，得六百十二首（实为623篇），合文忠有跋者一百二十七首（当为见于辑本《录目》之外尚存之《跋尾》篇数），共得七百三十九首，千卷之藏已得三分之二”，意即千卷的《集古录》（一种拓本装帧为一轴，千卷即千种），其概貌已可恢复大半。

需要指出的是，传今的《集古录跋尾》并非欧阳修身后其子欧阳发等所编《事迹》中提到的“《集古录跋尾》十卷”，因为《集古录》原是欧阳修随其所得而编卷的，而不按世次之先后，最初的《跋尾》和流行的刻本莫不如此；直到庆元间周必大等校刻《跋尾》时，才改而按照周秦至五代古器物的时代先后编排，并在每卷卷末注明原先的卷帙；而且他们刻完了《集古跋》，才得到一本欧阳棐编的二十卷的《目录》，便又参订《目录》所列碑石的年月，一一注于相关的跋尾之下。流传下来就是今本《集古录跋尾》十卷的模样，有器物名、跋文、铭文及释文等，卷末还附校勘记，共存跋尾429篇。

关于《集古录目》、《集古录跋尾》和《集古目录》的名实之辨，顾永新君《欧阳修学术研究》^①另有高见，可资参考。书中认为欧阳修的《集古录目》就是《集古录目跋尾》或《集古录跋尾》的别名，而欧阳棐的《集古目录》（又名《集古录目》）乃是另一书。

仁宗无子，立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十三子为皇子，改名赵曙，后继位为英宗。吴奎、赵

^① 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页276—289。

概、欧阳修撰《嘉祐时政记》，专记立英宗事。英宗即位以后，对濮王应奉何种典礼，大臣们意见不一，司马光等认为当称皇伯，欧阳修认为应称皇考，后曹太后下诏，称之为亲，又遭御史吕晦、范存仁等反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许多大臣在这场争议中受责遭贬。神宗熙宁初，欧阳修知亳州，成《欧阳濮议》四卷上之，提出“濮议之兴，人谓父可绝”，坚持他自己的观点（《郡斋》卷六）。

《归田录》二卷乃欧阳修所撰笔记，专记“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有序（本集卷四四《居士集》卷四四《归田录序》）。《宋史》卷二〇三《艺文二》著录此书为八卷。

熙宁间，欧阳修退居汝阴，著《欧公诗话》一卷以资闲谈，故《郡斋》卷一三称此为“戏作”。今又名《六一诗话》。

宋太宗开宝间，宰相薛居正奉诏修成《五代史》一五〇卷。欧阳修认为此书“繁猥失实”，独自重加修订，成《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中。欧阳修卒后，朝廷下令由国子监刊行于世，人称《新五代史》，并赞其文可继班固、刘向，流传遂广（《郡斋》卷五，《直斋》卷四作《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旧五代史》则逐渐式微，至无完本。

欧阳修对《周易》、《诗经》深有研究。《易童子问》三卷，假设解答童子问疑，阐述其易学观点（《直斋》卷一）；还为东汉郑玄《诗谱》补亡，使之成为完书，《郡斋》卷二作一卷，《直斋》卷三作三卷，《宋史·艺文一》作《补注毛诗谱》一卷；又有《诗本义》十六卷（《直斋》卷三、《宋史·艺文一》，《郡斋》卷二作《欧阳诗本义》十五卷）。

欧阳修去世以后，在吴充所撰《行状》、韩琦所撰《墓志铭》、苏辙所撰《神道碑》中都还提到欧公著《归荣集》一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等，见于欧阳修诸子编辑的家书《总目》八卷。《归荣集》当是欧阳修致仕后所作。《四六集》，南宋绍熙之前有过浙西刻本，所收为表奏书启之类，但编排失次；周必大等校刻欧集，重新编次，仍为七卷，但更名为《表奏书启四六集》。《奏议集》，宋时曾在衢州单刻过十八卷；又有韶州刻《从谏集》八卷（《郡斋》卷一九作《谏垣集》），皆欧公在谏院时所上奏疏，这个集子不见欧阳修家书《总目》的著录，后周必大等将衢州本的一些篇章移入《表奏四六集》，再合并韶州本，仍成《奏议集》十八卷（本集卷一一四《奏议集》卷一八校勘记）。

另外，欧阳修为宦几十载，编纂过《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太常礼院祀仪》二十四卷（《宋史·艺文三》），和王洙、余靖、孙甫编修了《三朝圣政录》十卷（《郡斋》卷六）；与同僚好友酬唱，有《礼部唱和诗集》三卷、《送元绛诗集》一卷、《送文同诗》一卷（鲜于侁作序），又有人编司马光、欧阳修、冯京诗作成《绍圣三公诗》三卷（以上《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八》）。又有《六一词》一卷，但里面混有五代词、他人伪作等（《直斋》卷二一）；一作《平山集》，亦杂冯延巳、柳永词和刘焯伪作等（本集卷一三三《近体乐府》卷三罗泌校勘记）。

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去世之后，其子欧阳发等对家藏文稿作过初步整理，故今传宋刻本上多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的题名。后苏轼又从其子欧阳棐那里得到了欧阳修手订的诗文766篇，“次而论之”，时为哲宗元祐六年（1091）六月十五日（一作三年十二月，是时苏轼为翰林学士）。见苏轼《居士集序》。

欧阳棐手中保留的这部手写家集，在徽宗宣和五年（1123）的时候又由欧阳修的孙子欧阳恕在景陵（今湖北天门县）校过一遍（明洪武十九年本危素《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后人称为“恕本”。

欧阳修的诗文在两宋有各种各样的编集，且在各地广为流传，有《欧阳文忠公集》八十卷（《郡斋》卷一九）、《庐陵欧阳先生集》六十一卷（《读书附志》卷下），又有《欧阳修集》五十卷、《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议》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宋史》卷二〇八《艺文七》）等。据称汴京官局、闽以及绵州、吉州、苏州、衢州、

杭州都有刻本行世（本集附周必大跋、丁朝佐考异，明洪武十九年本危素《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其中《别集》二十卷，在徽宗政和四年（1114）之前业已成书，为汝阴（今安徽阜阳）王乐道、王性之父子所编，且皆“公家集所不载者”，并请李之仪撰序（《姑溪居士后集》卷一五《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即《别集》所收诗文俱出《居士集》之外。

欧阳修文集种类繁多，各本异文无算，而且这里面还有欧阳修自己的原因。欧阳修对待创作极为认真，经常反复修改文稿，如他的名篇《醉翁亭记》起句“环滁皆山也”，这五字是从最初的数十字反复删改而定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晚年欧阳修亲自审定平生所作，用思甚苦，夫人劝止之，欧公笑答是因为“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宋沈作喆《寓简》卷八）；南宋周必大看到过欧阳修手写的《秋声赋》和《刘原父手帖》，都有好几本，用字往往不同。所以欧阳修的文集久无定本，文字不能统一，学者病之。

到南宋光宗绍熙、宁宗庆元间，周必大解相印归庐陵后，便召集孙谦益、丁朝佐、曾三异、胡柯、罗泌等人，遍搜旧本，互加编校，定为《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内含《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共10集。另外还有《附录》五卷，以及胡柯据桐川薛齐谊、庐陵孙谦益、曾三异三家旧谱，旁采史籍，参照本集而重新修订的《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一卷。就卷中校语及卷后考异、校勘记看，所校旧本有“石本、京本”等多种。且各集是随得随刻，皆出自周氏家塾，起绍熙二年（1191），迄庆元二年（1196），时间跨度为五年（以上本集附胡柯《年谱》后记、周必大跋、编定校正及覆校题名）。周必大校订的这个一五三卷本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都有翻刻，成为后世诸刻的祖本。

就现存宋刻本考察，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绍兴衢州刻本《居士集》五十卷残本（存目录、卷三至一五、二九至三三、三七至四七，计29卷），乃海内孤本，被认为是传世《居士集》中时代最早的（傅增湘跋）。此本书名签题“欧阳文集居士集”，扉页画一幅《寒松图》，有“庚午（当1930年）冬十月十四日”“曾寿”（陈宝琛）观书题款。残本起于《居士集目录》，卷首有“沅叔藏宋本”、“藏园秘籍孤本”等朱印，前三页系抄补，原刻起于第四页“《送章生东归一首》”（第二卷），卷终题“六一居士文集目录”；末有“庚午暮春”朱益藩手写与樊增祥、柯绍忞、邵章、冒广生等七人聚集藏园获观宋本之题记；后钤“忠谏继鉴”、“双鉴楼收藏宋本”等印记。正文存卷起于卷三，题署一行“六一居士欧阳修”（每卷皆见），钤“沅叔心赏”等印。该卷细目接连正文，行款为半页7行行14字，字大如钱，开版疏朗，左右双边，书口窄小，单黑鱼尾，下题书名简称“居”及卷页，间有刻工姓名；卷末题“熙宁五年秋七月发等编定”（每卷皆见）。卷四七末有“庚午三月既望闽县陈宝琛观”题款一行，钤“沅叔审定”等印记，后有“庚午三月既望”傅增湘及朱文钧二人所书长篇题跋二则。傅跋二页叙此本得之淮南刘氏，原为内阁大库之物，并详考此本版刻特征，指出其“桓”、“枸”字缺末笔，“慎”字不缺，当为南渡初所雕；且“其大字阔幅似蜀，而结体镌工又似杭”，最后参之诸目录、证之考异，从异文证据得出是衢州本。衢州本虽刻于南宋初，但从各卷卷末所题“熙宁五年秋七月发等编定”来看，当源自熙宁本，所以“得见此本犹可睹欧公手定之旧”；而有人认为此本即为熙宁本，讳字缺笔乃出于改剔后印，傅增湘对此不敢苟同，“执此悬定为熙宁祖本，则非余所敢知矣”。另外，傅增湘当时所见的宋本还有天一阁藏“密行细字”的庐陵刊本六十四卷、北平图书馆等处所藏五部庆元刊本，但都早不过衢州本。朱文钧题跋一页认为此本当是北宋开版，南宋初完工；其《目录》一卷，当系名手用瘦金体写刻上板。

宁宗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刊本《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文物局、江西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等处皆藏有宋刻本，

多数系残卷，唯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宋庆元本乃全帙（《宋人别集叙录》^①引《日本汉籍录》谓有三十八页为日人补写），系金泽文库、伊藤家旧藏，并于昭和二十七年（1952）被指定为“日本国宝”（《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②）。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有三：一本存一百二十八卷（首尾基本完整，中缺卷三至六、三八至四四、六一至六三、九五、一三四至一四三，计二十五卷，配以明抄本。《中华再造善本》已经影印。

该本首尾基本完整，但中缺卷三至六、三八至四四、六一至六三、九五、一三四至一四三，计25卷，配以明抄本。首为《欧阳文忠公文集总目》、苏轼所撰《居士集序》、《居士集目录》（细目），正文卷首第一行上段署“居士集卷第一”，下段作“欧阳文忠公集一”，半页10行行16字，左右双边，书口上端为刻字字数，中间注“欧阳文忠公集一”，下端为页码和刻工姓名。《居士集》五十卷，卷中多有小字校语“一作××”，每卷卷末都有刊记两行“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后附“朝佐考”^③以及校勘记，且每条校记之前皆以阴文标志出异文所在篇目，有些卷末个别校记前还有“续添”字样；考异及校记中提到的校本有“衢本、建本、吉本、罗氏本、蜀本、公家定本、恕本、石本”等多种。《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集》十八卷、《杂著述》十九卷（包括《河东奉使奏草》二卷、《河北奉使奏草》二卷、《奏事录》一卷、《濮议》四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笔说》一卷、《试笔》一卷、《近体乐府》三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每卷卷末大多无刊记（仅《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一至四末署“绍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编次，郡人孙谦益校正”，《河东奉使奏草》卷上、《河北奉使奏草》卷上署“绍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刍校正”，《濮议》卷四末署“绍熙五年十月郡人孙谦益、王伯刍校正，《近体乐府》卷三末署“郡人罗泌校正”），亦无考异，只有用阴文标志的校勘记。卷一五三之后《附录》五卷，卷一祭文、行状、谥诰，卷二墓志铭、神道碑，卷三、四传，卷五事迹（子欧阳发等述）。末又有“编定校正”题名4行：“绍熙二年郡人孙谦益字彦撝，绍熙三年承直郎前桂阳军军学教授丁朝佐字怀忠，绍熙四年郡人乡贡进士曾三异字无疑，绍熙五年郡人登仕郎胡柯字伯信”；以及“覆校”题名8行：“庆元元年州县学职事葛濛字德源，王伯刍字驹甫，朱岑字山父，胡柄字谦甫；庆元二年郡人迪功郎新临江县主簿曾焕字文卿，郡人乡贡进士胡涣字季亨，郡人乡贡进士刘贇字棠仲，郡人罗泌字长源”。最后是周必大跋。

周必大主持的这次对欧阳修文集的全面校正刊刻，规模很大，从绍熙二年（1191）到庆元二年（1196），历时五年余，十集一五三卷是随得随刻，主要的编校人员有12人，也是分成几批来从事校刻的。周必大跋中提到的是孙谦益、丁朝佐和曾三异，文集的校刻题名有“孙谦益、丁朝佐、王伯刍、罗泌”的名字，还有胡柯修订了《年谱》，这6个人应当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的。《直斋》卷一七谓周必大定为此本，《居士集》以下十集各刊于家塾，其子周纶又得欧阳棐编次的传家集，嘱曾三异校正，使得该本更为完善云云。我们所见的庆元刻本校记确有好几部分，正文中的小字校语当出孙谦益、丁朝佐、王伯刍、罗泌之手；卷末的大字考异是丁朝佐作的音义考证，里面引到“公家定本”、“恕本”，则还包括了曾三异据欧阳棐编次之本所作的校勘；阴文标志的校勘记中标明“续添”者为初次校正后又添入刊行，当是庆元时覆校者所为。

又一本存四十卷（卷四一七，五五一六七，七二一七三，八七一八九，一一二一一一七，

^①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页173。

^② 严绍璁《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页14。

^③ 按：即丁朝佐所作有关音义等的考证按语，一般称“考异”。

一二〇—一二四，一四六，一四八—一五三，其中六二—一六五配抄本）；一本存五卷（五二—一五四，九六，一一九）。另，江西省图书馆藏三十二卷，初印清湛，亦可宝。

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八九部宋刻残卷，今见两部：一部存《居士集》五十卷，其中卷三〇至三四配以清初抄本，《居士集序》前缺，《目录》全，钤有“梅溪精舍”、“玉兰堂”、“辛夷馆”、“乾学之印”、“铁琴铜剑楼”、“季振宜读书”、“绶珊珍藏善本”等朱印。另一部仅存卷二〇至二三首尾相连的4卷，扉页有“正闇”手跋，钤“群碧楼读”印；卷二二页一四以下缺，且有“乙丑三月群碧楼记”题跋一页，钤“正闇学人”印；卷二三全。邓邦述（1868—1939）号正闇居士，有群碧楼藏书，则此书为邓氏旧藏，其跋当题于1925年。以上两部宋刻，行款特征俱同前周必大本，则可断为庆元刻本之残帙。

前面提到，唯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宋庆元本乃全帙。《直斋》卷一七谓周必大之子周纶又得欧阳棐编次的传家集，嘱曾三异校正。日本学者东英寿研究了天理本，认为：“周必大的原刊本于庆元二年（1196）刊行，周纶修定的工作则大约在十年后的开禧年间完成。所以说天理本虽然不是周必大的原刻本，但是可以推定是紧接其后的周必大之子周纶修订并刊行的南宋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藏的诸本不同。”^①且于天理本中发现了欧阳修的96篇书简，为现今所传欧集诸本所无^②，故此本弥足珍贵。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版周必大本系残本，分装18册，《图书寮典籍解题》第78页著录作“残存六十九卷”，经核对，实存68卷，具体卷目如下：

卷二四—二九（居士集卷第二十四至二十九），三五—四五（居士集卷第三十五至四十五），七六—八九（易童子问卷第一至三、外制集卷第一至三、内制集卷第一至八），九三—一一〇（表奏疏启四六集卷第四至七、奏议卷第一至十四），一一五—一一七（河东奉使奏草卷上下、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一一九—一二五（奏事录、濮议卷第一至四、崇文总目叙释、于役志），一三二—一三三（近体乐府卷第二、三），一四七—一五三（书简卷第四至十）。

其中卷七九—八一、一五〇—一五三有抄补或全部抄补；卷八六、九三缺首页；卷一四七页十一后缺，卷一四八页十二前缺，遂而被合并。

此本前缺，起自“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欧阳文忠公集二十四”，右下角栏外钤盖“奚疑斋藏书”印。半页10行行16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黑鱼尾。书口上端有刻字字数，中间题写书名卷数，下端为刻工姓名。卷末有刊记，如卷二四等末题“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卷一一五、一一七末：“绍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卷一二三末：“绍熙五年十月郡人孙谦益王伯芻校正”；卷一三三末：“郡人罗泌校正”。卷后附用阴文标志的校勘记。

凡“弘、构、完、树、让、慎、敦、竖”等字缺末笔，遇“真宗”、“天子”、“太宗皇帝”等语上空一格。

《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页15）既谓此本是周必大本，却又著录作“宋绍熙年间刊本”，恐因此本卷一五三末尾系抄补，后无“覆校”题名、周必大跋，故仅据卷中题记“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绍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等而定。不确，当是庆元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此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本六十八卷，存卷较多，其中卷三八—四四，九五（计7卷）可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所缺，且“字画疏朗、刊印颇佳”，在日本藏本中仅次于天理图书馆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

^① 东英寿《关于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见其《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页194。

^② 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籍选刊》^①已影印。

另有书名为《庐陵欧阳先生文集》的宋刻本二部，俱是残卷。一部仅存卷五七、五八，有清曹元忠跋、邹在衡跋、蒋确题款，藏上海博物馆；一部存卷一至五、卷一二至三二、卷四六至六一，凡42卷，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后者半页14行行25字至28字不等，左右双边，线黑口，版心有刻工名，避高宗赵构讳。卷前无序文、目录，直接入正文，内容出自《欧阳文忠公集》，但已经移易删选：卷一至五为赋；卷一二分上、中、下，为论；一三至二三书启，二四至二六序，二七、二八记，二九祭文，三〇至三二表、奏状，四六至五一墓志铭，五二、五三归田录上下，五四题跋、杂著，五五至六〇集古录跋尾，六一欧阳氏谱、祭文、行状、谥议、墓志铭，且“印面完善，刻工亦精”（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是书当刊于南宋，与通行的一五三卷本编次不同，编刊者不详。

总之周必大庆元刻本问世之后，以其收录全、校勘精、刻印佳，迅速取代了诸旧本，且历代翻刻不绝如缕，遂成为欧阳修文集众多版本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五三卷系统的祖本。

又该本校勘记里所引到的“恕本”，即是欧阳修之孙欧阳恕手校之写本，当周必大病重时，才从参知政事李光家得到它，其子周纶便嘱旧门客们考订后将校记编入。后欧阳恕的手校本归于军器监簿曾天麟家，明初其裔孙礼部侍郎曾鲁取他本详加校勘，文字以写本（当指恕本）为据，篇次卷第依吉本（当指庆元本）为定，体例仿朱熹《韩文考异》，又编《拾遗》一卷，录吉本所缺而见于他本者。最初在永丰县学学刊刻（以上危素《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这个带曾鲁考异的本子，明代多次加以翻刻，今传本都是单刻的《居士集》五十卷。

另外，明清两代又出现了后人重加编校的一三五卷、一三〇卷和一〇五卷的《欧阳文忠公集》等等，它们显然当归于特殊的类别。

下面我们就分几大部分来分析欧阳修文集在宋以后的流传情况。

一五三卷系统

“元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附录五卷（今存佚不详），民国时上海涵芬楼曾据以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与庆元本相较，行款变为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黑鱼尾，书口中注“欧文卷×”及页数。《总目》后多“六一先生小影”及像赞、《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末有庆元二年（1196）胡柯所撰《年谱》后记。卷末校勘记已将“续添”者依次插排入旧校当中，且条目偶有增加，故校记序次已与庆元本不同，如外集卷四将“续添”的“《乞药有感》”、“《冬夕小斋联句》”二条插排在“《鹤联句》”之前，又将校记后的补遗诗《来燕堂与赵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韩子华联句》移入正文诗末；又如外集卷七增加了“《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诗二首》”一条校记，等等。

关于《四部丛刊》的底本，日本学者清水茂曾指出：“《四部丛刊》的目录虽然被称为元刊本，参见故宫博物院编的《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北京，1933年），其中有可以与之认定为同样版本的书影，注明是明刊本。这种说法应该是正确的。”^②后森三秀二终于考清了《四部丛刊》所收不是元刊本，而是“以明代的内府本为原本的版本”。^③则所谓的

^①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

^② （日）清水茂《唐宋八家文》（二）（朝日新闻社，1978年，第99页），见（日）东英寿《关于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页194脚注①）引。

^③ （日）森三秀二《围绕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经济学季报》第51卷第10号，2001年），见东英

“元刻本”并不存在，《四部丛刊》的底本与明代内府所藏明刻本版本相同，这个“元刻本”实应是“明内府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残帙，仅有《内制集》八卷和附录五卷，馆藏卡片著录为元刊本，书套内却写作明刻本。原为清吴湖帆梅影书屋旧藏，有“吴县潘承厚承弼读书印”、“吴印翼燕”等印记，以及吴湖帆、潘承弼等题跋，吴氏认为序（指《内制集》序）及第一卷是元刻本，第二卷至第八卷为宋刻本，潘氏则认为认为是宋刻元修本，意见也不统一。今审其行款特征与明内府本、明天顺本全同，而周必大跋在附录卷末，与明内府本合，则此本与明内府本有很接近的渊源关系，不过它与明内府本在字体上稍有区别，个别用字也不同。

明刻本中翻刻庆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的为数不少。

①可考知的第一本为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所刊。据明杨士奇《东里别集》卷二《圣谕录中》第三条载，朱高炽在东宫颇喜欧文，曾命杨士奇与赞善陈济校讎，“正其误，补其阙，厘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传。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详见《宋人别集叙录》卷四 P174 所考）。另据《圣谕录》所载各条编年次序，此书校刻当在永乐二年（1404）七月至七年之间。

今传明刊本中并没有考订著录为永乐本者，其存佚情况不明。

②今传本中能确定时代的最早为天顺六年（1462）刻本。海虞（今江苏常熟）人程宗，字源伊，天顺中知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市），得胡文穆公子永肃所献家藏内阁明本，遂捐资翻刻，嘱教授郑钢校其字画，并请郡人“山东按察副使致仕”彭勛和出使交南路过庐陵的“翰林侍读学士”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钱溥为新本撰序。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天顺本出于内府，用花纹绫锦四合套装帧，计 30 册 6 函，每册皆钤“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等朱文大印。卷首有天顺六年（1462）钱溥与天顺五年彭勛撰《欧阳文忠公全集序》、宋周必大跋、《六一先生小影》及像赞、《年谱》、《总目》、《居士集序》、《居士集目录》。除两篇明人序为新添外，其余皆见明内府本，但序次稍异。正文行款特征则全同明内府本；附录五卷之后亦照录宋庆元本的“编定校正”及“覆校”题名。因彭勛《序》明言底本为“内阁明本”，则作为《四部丛刊》底本的明内府本，和天顺本的底本“内阁明本”，很可能就是相同的本子，颇疑即朱高炽永乐刻本。

而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明天顺程宗刊欧阳文忠公集跋》中谓“程守所据内出之本当为庆元原刻无疑”，显然未细读彭勛序。傅氏又认为天顺本的初印之本“楮墨明湛，世人往往误为元刊”，而涵芬楼印行的《四部丛刊》“及细观之，实即此本之初印者耳。”但天顺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行款虽然相同，却将周必大序从卷末移至卷首，且新添钱溥、彭勛序，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故实际情况应当是《四部丛刊》的底本与天顺本的底本版本相同，很有可能就是明内阁朱高炽永乐刻本，只不过天顺本新刻了钱溥、彭勛两篇序。傅增湘认为天顺本的底本是宋庆元本以及《四部丛刊》的底本是天顺本的初印本，皆为误断。

③天顺本问世之后三十年，书版磨灭，吉安知府姑苏（今江苏苏州）人顾福（字天赐）、同知欧阳允直从前经筵讲读官宣溪居士王世赏手中得到一内府本，遂照之订讹补缺，补版重印了《欧阳文忠公全集》。当时参与校补的还有判府赵藺完（“完”字不清）、杨文翰、推府程州用、陶廷贵等人。时为弘治五年（1492），王世赏有《题欧阳文忠公集后》。这个弘治重修本，今传本尚众。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看，此本版面业已模糊，与天顺本相异之处在于：卷首少小影与像赞，《年谱》次《总目》后，周必大跋在“覆校”题名后，且卷末多

寿《关于欧阳衡的〈欧阳文忠公全集〉》（《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页 196 脚注①）引。

王世赏跋。

④正德五年（1510）慈溪（今属浙江）人刘乔来知吉安，第二年得到郡庠生欧阳昂藏本，遂亲加校正，命工翻刻。正德七年二月完工，刘乔撰跋记录重刊经过。

正德翻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此本起于天顺五年（1461）彭勛《新刊欧阳文忠公全集后序》，无钱溥序、小影及像赞，《年谱》在《总目》前；正文行款特征基本同天顺本，只《居士集》卷一至六书口为白口、单白鱼尾；又《外集》卷一至七系抄补；卷末除周必大跋、王世赏跋外，增刻正德七年（1512）刘乔《题欧阳文忠公集后》。

⑤嘉靖十五年（1536）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季本为吉安府司马；十六年，摄郡。他见旧版剥落残缺，遂多方寻求善本校勘欧集，并命庐陵县儒学训导詹治负责重新刊校，詹治撰有跋文。

这个嘉靖十六年（1537）季本、詹治重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其中卷一四三至一四七配抄本。卷首诸序目及正文行款特征全同天顺本，而《附录》五卷之后为刘乔跋、王世赏《题欧阳文忠公集后》，还有嘉靖十六年詹治新撰的《跋欧阳文忠公文集后》。

⑥嘉靖三十六年（1557）安陆（今属湖北）人何迁任江西抚都院，令属下再校，剔换了三分之一旧版，重印了欧集，但是未刻诸明人旧序，何迁有跋，撰于嘉靖三十九年。何迁这个递修本，今传本甚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等印，首为周必大跋、《居士集序》、《六一先生小影》、像赞、《四朝国史本传》、《年谱》、《总目》、《居士集目录》；正文行款同正德本，但书口改为白口，单白鱼尾；《附录》变成六卷，分别为卷一制词，二祭文、行状，三墓志铭、神道碑，四、五传，六事迹，末有宋人题名；最后是何迁《跋》。

从上面几本可以看出，刘乔正德本经过嘉靖年间季本、何迁两度补版递修，但3次的本子其卷首末附录的序目数量和序次各异；行款虽同，书口却有变化；尤其是何迁本将附录从五卷改成了六卷，变乱了宋刻本的旧式，也没有被后世的刻本认同沿袭。

⑦隆庆五年（1571）八月南丰（今属江西）人邵廉“承乏建郡”（即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在福建为官，取旧本二部，与乡官林命重订，翻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附录》五卷，邵廉撰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首为邵廉《序刻欧阳文忠公文集》、天顺六年（1462）钱溥《重刊欧阳文忠公全集序》、邵廉跋、《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总目》、《居士集目录》。正文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单边，单黑鱼尾，书口上端标“文忠公全集”，鱼尾下部注卷页及刻工姓名。《居士集》每卷卷末都有两行宋人校勘题名及校勘记，在卷二起首有署名一行“南丰后学邵廉校刊”（其余各卷则为空白）；《附录》五卷之后为宋人题名与周必大跋，末附天顺五年彭勛《新刊欧阳文忠公全集后序》、弘治五年（1492）王世赏《题欧阳文忠公集后》。可以判断，隆庆本源于天顺刻弘治重修本。

进入清代，重刻全集一五三卷等亦很频繁。

①在乾隆丙寅十一年（1746），庐陵又有“孝思堂”新刻本问世，参与校订的有欧阳修裔孙钧溪副贡生教谕欧阳安世（字劭平）等十余人。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首有书名页“《唐书》并《五代史》即刊，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孝思堂藏板”，且在上方镌“乾隆丙寅重梓”一行；次为《居士集序》、《宋文忠公小影》及像赞（较旧本多“清浏从孙玄百拜撰撰圭斋”一首）、《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四朝国史本传》、《欧阳文忠公全集总目》（较旧本少《居士集目录》）。正文半页9行行20字，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书口上端题“欧阳文忠公全集”，鱼尾下部为卷页；正文中有小字校语，但卷末无题名与校勘记。《附录》虽为五卷，实际不同于旧本，改为：卷一制词，卷二祭文、行状，卷三墓志铭、神道碑，卷四记神清洞，卷五事迹。之后是《累朝校刊全集名氏》，从“宋元祐六年（1091）男发、奕、棐、辩，门人苏轼字子瞻”起，记绍兴（当为熙）二（1191）、三、四、五年孙谦益等、庆元二

年（1196）葛濬等、（明天顺五年，1461）程宗、（弘治四年，1491）顾福、正德壬申（七年，1512）刘乔、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季本、嘉靖乙卯（三十四年）陈珊等、嘉靖庚申（三十九年）何迁、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曾弘、乾隆十一年（1746）欧阳安世等历代庐陵刻本校刻者官职、姓名、籍贯等。末为欧阳安世《重刊文忠公全集跋尾》，谓同十数族人各出家藏读本互校，从乾隆十年冬十二月至十一年夏六月刊成此集，共刻板 2600 余面，藏于吉州刺史公祠。

今又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乾隆十二年刻本”，首尾不完，内容版式与前本基本相同，但卷前多出一篇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彭家屏序（缺首页），《附录》之后的《累代校刊姓名》亦与前本文字不尽相同，如起首改为“宋元祐六年（1091）男发、奕、棐、辩同集，门人苏轼携弟苏辙编次”；多出“万历元年（1573）郡太守雷以仁，湖北夷陵人”、“万历己卯（七年）首定八大家古文茅坤，浙江归安人”二行；清朝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条作“合刊欧文二集曾弘，本郡吉水人；又累刊八大家文孙琮、吕葆中、汪份”；乾隆丙寅（十一年）条下欧阳安世等十余人的序次亦多更改（前本欧阳安世在第六位，此本位于第一），且缺坏字甚多，页三以下佚去，故看不见其他序跋文字。按：这个本子应当是拿乾隆十一年的旧版重印的，但在卷首增刻了彭家屏新序，又将卷末历代校刊人姓名加以订正之后重新改刻一过。可见乾隆孝思堂刻本既有十一年的初印本，还有十二年的新印本，二者内容并非完全一致。

②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馆臣据江西巡抚采进的欧阳修文集，校抄入《四库全书》。前有《御制读欧阳修〈纵囚论〉》、苏轼和周必大的《文忠集原序》、《四朝国史本传》、《文忠集年谱》，《文忠集》一五三卷，《附录》五卷。《四库全书总目》谓“此本为周必大所编定”，但从卷末无宋人题名与校勘记（卷中仍保留小字校语）、《附录》五卷内容不同于宋庆元本而同于乾隆十二年欧阳安世本来看，其底本不是宋本而应该是欧阳安世本。

③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又有惇叙堂刻本，今见上海图书馆藏本。其书名页曰“乾隆壬子重整，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惇叙堂藏板”；卷首有《乾隆二十四年钦奉御制欧阳修小像诗并序》、《居士集序》、周必大跋、《四朝国史本传》、《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宋文忠公小影》及像赞、《累代校刊姓名》、《集古录目序》、《濮议序》、《内制集序》、《欧阳文忠公全集总目》。在周必大跋后有清同治五年（1866）徐时栋手题一段，对周必大本的编次体例提出异议，认为《居士集》五十卷之外各集当编为《外集》七十六卷，《易童子问》至《诗话》共 13 种当别为《外编》，这样才井然有序。此论可备一家之说。正文半页 9 行行 20 字，左右双边，书口上方题“欧阳文忠公全集”，下方题卷页；开卷题“居士集卷第一，集一”，并有“柳泉书画”印；每卷卷末均无校勘题名及校勘记等；其中卷四五整卷脱去，衬有白纸 10 张。《附录》五卷同欧阳安世本。从该本在《乾隆二十四年钦奉御制欧阳修小像诗并序》后所附“欧阳修嗣孙臣安世恭和圣韵”诗、校刊题名止于“乾隆丙寅庐陵嗣孙钓溪副贡生教谕欧阳安世”等以及《附录》内容来判断，当是据欧阳安世本重刊。

④嘉庆二十四年（1819），欧阳修的裔孙欧阳衡（号梅龛）任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知府，政务之暇，取乾隆十一年（1746）其族叔祖欧阳安世刊本，与从父叔平先生共同校讎，草创凡例，重新刻印了《欧阳文忠公全集》。就其《凡例》来看，此本仍是一五三卷、《附录》五卷，但是对历来沿袭的宋庆元周必大刻本的内容和编次却作了很多地方的调整：如《杂著述》中删去了《笔说》、《试笔》两种；所有校记皆仿朱熹《韩文考异》体例；编次上“惟诗仍其旧，余悉以年月前后为次，不知者缺之”，即将文章尽量作了编年；将原本《附录》卷一的制词、谥议分系于《年谱》内；各集之后保留宋人原跋，小字标注“衡识”表明欧阳衡的见解；注“增”字指原本缺载而据别本补入者，注“疑”字乃疑为伪作者等等。

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近人傅增湘校本。该本首有《欧阳文忠公小影》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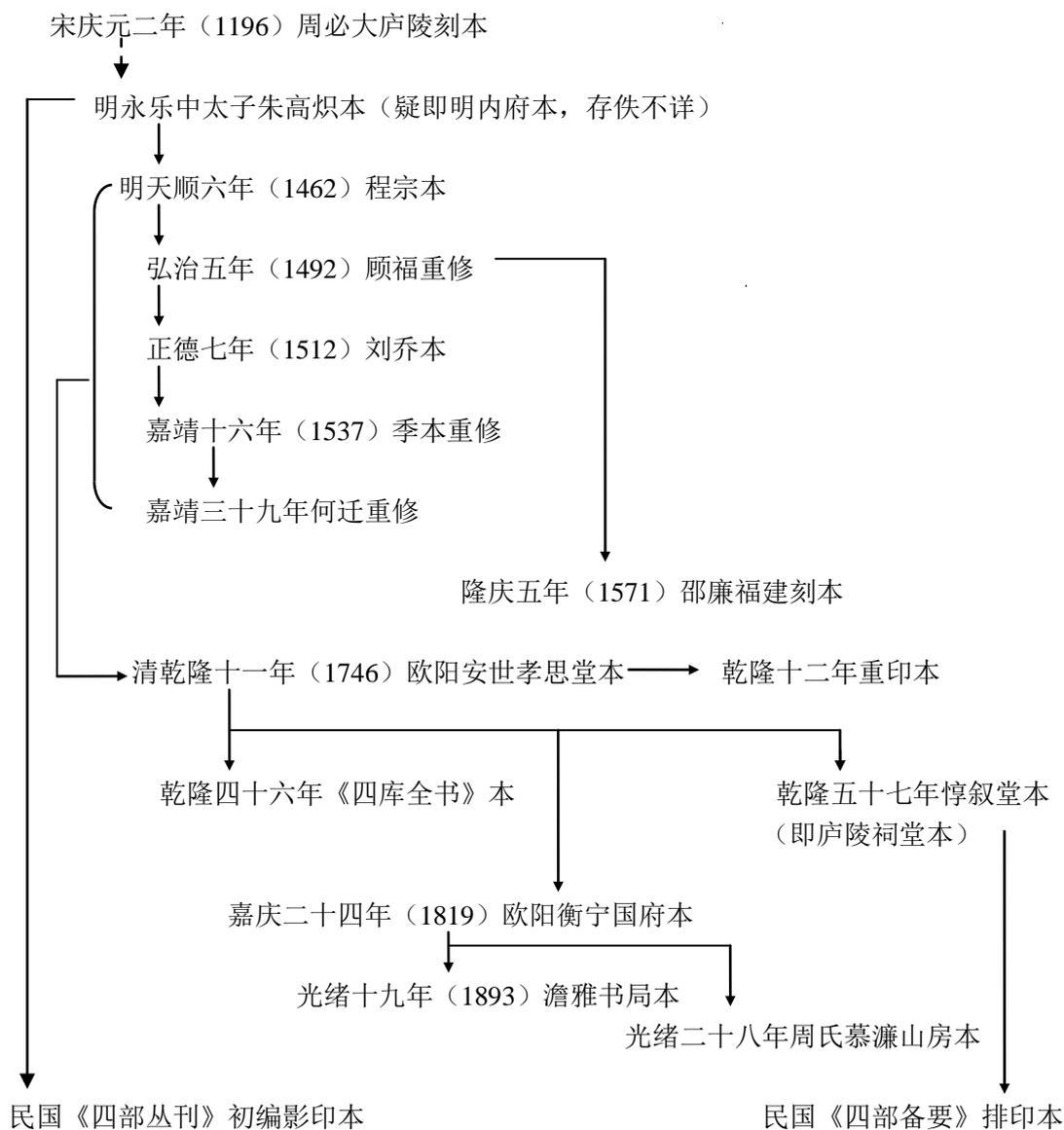
像赞、《乾隆十七年壬申高宗纯皇帝（即乾隆）题宋臣欧阳修遗像诗并序》（实同乾隆惇叙堂本《乾隆二十四年钦奉御制欧阳修小像诗并序》）、《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文忠公集》、《欧阳文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前）。《卷首》整一卷：《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御批宋臣欧阳修文》、《高宗纯皇帝御批宋臣欧阳修文》、《四朝国史本传》、《宋史本传》、《年谱》、《居士集序》、周必大跋、嘉庆吴鼐《序》、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十七世孙欧阳棨《跋》、嘉庆二十四年欧阳衡《重刊先文忠公全集叙略》、《凡例》、《欧阳文忠公全集总目》、《累代校刊姓名》（与乾隆欧阳安世本大同小异，没有茅坤、曾弘、孙琮等，末尾多嘉庆二十四年欧阳衡题名一条）、《欧阳文忠公全集目录》（实《居士集》细目）。正文卷首第一行题“居士集卷第一，全集一”，第二行则署“二十七世孙衡校刊”（每卷皆有），半页10行行24字，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书口上端标“欧阳文忠公全集”，鱼尾下卷页中间小字注“居士集”；小字校记全部散见正文中，卷末不再出宋人题名与校勘记等。《附录》五卷改为：卷一《事迹》58条，卷二《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16条（此卷增入），卷三祭文、行状，卷四墓志铭、神道碑，卷五记神清洞，末有欧阳衡跋。总之，该本除卷首内容丰富、《附录》五卷有移有增外，与所有旧本的最大区别就是文章的编次作了不少改动，而且连欧阳修亲定的《居士集》也不例外，如从卷一五赋起，每卷类别不变，但所收各文则都按编年调整了排次，可参见傅增湘校。自从宋庆元周必大刻本问世之后，就被奉为定本，历元、明、清三代，各种欧阳修文集几乎都是一成不变，大同小异，所以嘉庆欧阳衡刻本可谓异军突起，改变了旧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重刻本。

⑤光绪癸巳十九年（1893）澹雅书局翻刻了嘉庆欧阳衡本，书名页题“欧阳文忠公全集”，有“光绪癸巳年澹雅书局刊”的牌记，行款特征全同，仅卷首所附诸文序次有异，分别为：《乾隆十七年壬申高宗纯皇帝题宋臣欧阳修遗像诗并序》、《四朝国史本传》、《宋史本传》、《先文忠公全集卷首目录》、《年谱》、《欧阳文忠公小影》及像赞、《居士集序》、周必大跋、欧阳棨《跋》、吴鼐《序》、欧阳衡《重刊先文忠公全集叙略》、《凡例》、《欧阳文忠公全集总目》、《累代校刊姓名》、《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圣祖仁皇帝御批宋臣欧阳修文》、《高宗纯皇帝御批宋臣欧阳修文》、《欧阳文忠公全集目录》（实《居士集》细目）。正文每卷卷首都保留“二十七世孙衡校刊”的题名，《附录》五卷亦全同欧阳衡本，末附衡跋。

⑥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又有周氏慕濂山房翻刻欧阳衡本，书名页题“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牌记作“光绪二十八年岁在玄默摄提格仲春月周氏慕濂山房校印”。亦有《先文忠公全集卷首目录》，卷首内容从《圣祖仁皇帝御批宋臣欧阳修文》到《累代校刊姓名》已见欧阳衡本及澹雅书局翻刻本，序次与二者都不全相同，不过更接近澹雅书局本（略）；正文行款亦同欧阳衡本，但每卷无“二十七世孙衡校刊”的题名，且《附录》卷末也无欧阳衡跋。

⑦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据“庐陵祠堂本”校勘，收入《四部备要》之中。与乾隆惇叙堂刻本相较，仅卷首周必大跋不在《居士集序》后而在《四朝国史本传》后一处小异，故此“庐陵祠堂本”即指乾隆五十七年（1792）惇叙堂本。

为清楚说明一五三卷系统的源流，现将所述各本的关系图示如下：



单刻《居士集》五十卷系统

经明曾鲁校勘考异的欧阳修文集，最初刊刻于洪武四年（1371）。当时蔡玘在欧阳修的祖籍永丰县（今属江西）当县令，捐俸禄为倡，取曾鲁校本，刊刻于永丰县学（明洪武十九年本危素《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今原刊已不存，所见皆为后出重修、翻刻之本。

①蔡玘刊刻的《居士集》五十卷，其中有不少字画缺损模糊、脱文错谬之处；洪武六年（1373），经县丞李均度与俞允中、李实、胡启等人花三个月的时间考订补正三十余版，重印了此集（明正德本李均度《新刊欧阳文忠公集序》）。此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但是个残本，仅存卷一一至三〇，卷端书名题为“居士集”。半页 11 行行 23 字，四周单边，细黑口，书口注“居士集×”，有刊工姓名，且页码连排，以“金、木、水、火、土”标识，满一百一转换，如卷二〇止于页一百，书口则题“木一百片”；各卷多有题名，卷首共 4 行“临川（按：曾鲁为新淦人，明属临江府，故临川当作临江。）后学曾鲁得之考异，古舒后学蔡玘行素订定，番阳后学李均度校理，古溧后学俞允中校正”，卷末则有“熙宁五年秋

七月男发等编定”；卷二一第六页有牌记曰“洪武六年癸丑九月永丰县学新刊”。该本刻印不佳，多有断板及字画模糊处，当是后出的据洪武原版重印之本。

②浙江图书馆所藏一本为明洪武六年（1373）永丰县学刻、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修《居士集》，五十卷全。此本前有苏轼《居士集序》及《庐陵欧阳先生文集目录》（即《居士集》目录），钤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桐城萧穆经籍图记”等朱印。版式特征基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本相同，亦以“金、木、水、火、土”标识页码，但卷首题名4行有个别卷被挖去，且在有些版面的书口上端镌有“嘉靖乙巳补刊”字样，如“金二”、“土六十五”等页；在卷五〇末有两行刊刻题记“洪武六年癸丑九月永丰县学新刊，文学李实胡启完理”；另外每卷卷终都刻上了“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一行，不像前本时有时无。该本目录卷第二十载神道碑铭7篇，缺卷第二十一，而正文卷第二十仅录碑铭3篇，另4篇见于卷第二十一；又目录在“卷第五十”祭文10篇之后又重出“五十卷”，录《祭石曼卿文》等7篇，而正文“卷第五十”则将二者合并，共收录祭文17篇。另外从其内容看，《居士集》五十卷外并未刻曾鲁所编的《拾遗》一卷。

③又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新刊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馆藏目录亦著录作“明洪武六年（1373）刻本”，可从内容到版式均与前洪武六年永丰县学刻本不合。该本首有洪武六年李均度、俞允中所撰《新刊欧阳文忠公集序》，次为《新刊欧阳文忠公集目录》（亦即《居士集》五十卷细目，每卷卷次之上刻有花鱼尾）；正文行款虽仍为半页11行行23字，但却是四周双边，大黑口，双黑鱼尾，上鱼尾下注“文集卷之×”，下鱼尾下则注页码；卷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第一行下方分别刊刻有“仁”、“义”、“礼”、“智”、“信”方印。各卷题头不一，有“新刊欧阳文忠公集”、“欧阳公文集”、“居士文集”、“居士集”、“欧阳文忠公集”、“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公忠集”、“欧阳公居士集”等多种；卷首题名有作“临川后学曾鲁得之考异，番阳后学李均度校正”的，如卷一、七、九等；有作“古舒后学蔡玘行素订定，番阳后学李均度校理”的，如卷一一，也有无题名的；卷末校勘记时有时无，如卷一无，卷二校记中引“丁氏按”（即宋庆元本“朝佐考”），卷三末则保留了“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一行题名。另外，该本目录与正文收录的内容也不尽一致，如目录卷二〇为“神道碑铭”7篇，而实际分别收录在正文卷二〇、二一；且此后目录与正文便依次相错，直至目录卷四九、五〇的内容，全部合并收录在正文卷五〇当中。

④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明刻本”残卷，存卷前目录，缺卷二四至二六、四四至四七计7卷，有“闾源真赏”、“汪印士钟”、“麟嘉馆印”等印记。该本除无李均度、俞允中序和少“新刊”二字外，其余特征与前本基本相同。另外在卷二一末有撰于“甲寅”（当1914年）的李盛铎跋，内引明邹缉《居士集书后》，谓故礼部侍郎曾鲁校《居士内外集》，在一“大字板本”上用朱笔小字注于上下旁边，邹氏曾录其所注考异；而且曾鲁所校的这部《居士集》洪武初永丰县令蔡玘取以镂板，建宁书坊又加以传刻云云。按：邹缉跋文又见《明文衡》卷四八，题作《书居士外集后》。据此，则明曾鲁所校欧阳修集包括《居士集》及《外集》；洪武蔡玘本只刻了《居士集》，没有《外集》；而曾鲁校本的底本，即所谓的“大字板本”，因引到了“丁氏按”，当是宋庆元本。李盛铎跋又曰：“《欧集考异》洪武为第一刻，建宁为第二刻，极迟亦在正统景泰之间，必较天顺本（按：指全集一五三卷）为前无疑……今得天顺前旧刻，虽非完帙，亦当珍之。”按：李氏认为他所得到的这一有缺损的曾鲁考异本即是建宁第二刻，或许近实。又据邹缉跋，他所见到的建宁坊刻本出现在他“官太学、居京师”之前，而考《明史》卷一六四邹缉本传，“建文时入为国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讲”，则建宁第二刻当出于洪武建文间。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两个本子应当是同一版本，但非同一印次，第二本刷印时间要早于第一本，第一本卷端题头的“新刊”字样当系增刻。它们都与前面介绍的洪武六年

(1373)刻本有很明显的差异。那么到底哪种本子才是真正的洪武本呢？据上述诸本特征分析，我们认为：细黑口、以“金、木、水、火、土”标页、书名为“居士集”的，是洪武六年蔡玘、李均度、俞允中、李实、胡启等人以曾鲁校本为底本校刻的原本，有牌记为证；且明《南雍志》卷一八载“《欧阳居士集》五十卷，分金、木、水、火、土各十卷，洪武癸丑（六年）刊成”可作旁证。而大黑口、以“仁、义、礼、智、信”标卷、书名作“（新刊）欧阳文忠公集”的，则是后出的明代翻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是洪武原版的后印本，故版面业已模糊；浙江图书馆藏本则是据洪武旧版在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补刊的重印本，原本模糊处已作部分剔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二本为同版先后刷印之书，但不是洪武原本，而是明代后来的翻刻本，第一本原被著录为“明洪武六年刻本”，概仅据卷前李均度、俞允中序而误断。第二本照李盛铎所说是翻刻洪武本的福建建宁坊刻本，考其刊刻时间当在洪武建文间。这样看来，洪武四年蔡玘刻本业已无传，而洪武六年李均度校正的本子亦无完整的初印本，只存后印之残本、重修本之类。

⑤有曾鲁考异的本子，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正统间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此本首有苏轼《欧阳文忠公集序》，次为明临川危素所撰《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这篇《后记》不见于洪武本以及后出的翻刻本，但它提到了危素所了解的欧集许多本子的情况，尤其是对欧阳修之孙欧阳恕的手写校本流传渊源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且是蔡玘在永丰县学刻完曾鲁考异之本后，邑人夏巽嘱危素撰此记文的。《后记》之后另页有题名一行“时柔兆摄提格县人陈斐允章校勘刊谬”（卷三五末亦见；卷二四末作“时柔兆摄提格中秋前县人陈斐允章校勘刊谬”；卷五〇末作“时柔兆摄提格县人陈斐允章重校讹谬”）。又次为《庐陵欧阳先生文集目录》（实为《居士集》五十卷细目），在“卷第五十”之后又重出“五十卷”（正文则均见于“卷第五十”）；正文半页12行行21字，左右双边，黑口，单黑鱼尾，书口中间注“欧文×卷”及页数；卷首题“欧阳文忠公集卷第×，临江后学曾鲁得之考异”；卷中有小字校语，且较他本为多，提到的校本有“家本”、“宣（和）本”、“苏本”、“吉本”等；卷末间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一行或“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兴（当为熙字）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二行题名，但无其他校勘记。我们知道洪武四年（1371）蔡玘知永丰时刊刻了曾鲁校本，洪武六年经李均度、俞允中等人修订重印。由于该本保留了危素为蔡玘刻本而撰的《后记》，则应源于洪武四年本；又“柔兆摄提格”为丙寅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著录该本为“明正统间刻本”，则当正统十一年（1446）。但是日人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四认为此乃洪武丙寅十九年（1386）刻本，因为其刻工“付彦成、吴昺、汝敬、徐子中”等又见明洪武刊本《唐文粹》；“吕仲、伯寿”又见元至正六年（1346）刘氏宗本堂刻本王注坡诗。张元济从曾鲁成书于元末明初，推为洪武十九年，并举该本刻工“士通、付彦成、刘侍者、詹理、周寿”等与元刊辽、金二史同，认为它“或经始于元末而毕工于明初也”（《涵芬楼烬余书录》集部页三八）。则此陈斐覆校本当为洪武丙寅十九年所刊，这比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断“正统（丙寅）”要早一个甲子。而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之藏号为10120的“明洪武初年永丰知县蔡玘刊本”，以及《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所载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明洪武年间蔡玘刊本”，均系此本。

⑥与此洪武十九（1368）年本近似的尚有一“明初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收”印。也是半页12行行21字，左右双边，但却是白口。收录内容基本同洪武十九年本，但是没有危素的《欧阳氏文集目录后记》，不过在全书末尾却出现了“时柔兆摄提格县人陈斐允章重校讹谬”的校勘题名。按：此本当系前洪武十九年本旧版改别书口之后再行刷印者，所以稍有差异。

⑦正德元年（1506）又有日新书堂《新刊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问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本存卷一至三四，另一本存卷一、二，二六至五〇，均为残帙。该本之书名内容版式行款全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翻刻洪武本相同（后者仅少俞允中序），这样一来，实际

上就可以断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正是正德本。这也证明了前面推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洪武六年刻本”实为后出翻刻本是成立的。且日新书堂为建阳（今属福建）书坊名，创始于元代刘锦文，而建阳在明代恰属建宁府，则日新书堂刊本也可称为“建宁坊刻本”，但它断非邹缉《书居士外集》所提到的出于洪武刻本的建宁书坊传刻本，因为那个本子刊刻于百余年前的洪武建文间。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跋明刻本（李跋认为即是建宁第二刻）与此本基本特征相同，系出同版，但无“新刊”字样，故刷印时间要更早一些。

再从卷二〇至五〇目录有脱衍的情况来看，可能是蔡玘洪武四年（1371）刻本已肇其端，而洪武六年（按：该本仅存后印残本，故只能推断而言）、十九年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修本皆沿袭其误；至于建宁坊刻诸本，为弥缝调和更是造成了目录与正文各卷迭次相错的严重舛乱。

另外，也有不带曾鲁考异的本子。

①嘉靖二十二年（1543），处州（今浙江丽水）翻刻了《欧阳文集》五十卷、《年谱》一卷。当时“浙江按察司副使欧阳子，冲庵清裔，出庐陵”，见当时通行的《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帙繁浩，“乃取其中《六一居士集》，授处州守李子冕翻刻之”（明唐龙《刻欧阳文集叙》）。按：核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八《职官八》，嘉靖间任提刑按察司副使者为欧阳清，上饶（今江西上饶市西北）人；而雍正《处州府志》卷八《官秩志上》载，嘉靖间任知府者乃李冕，章邱（今山东章丘县西北）人。他们两人正是这次刊刻的主持者。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处州本首有唐龙叙、苏轼序、《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欧阳文集目录》（即《居士集》目录）。正文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双边，白口，单白鱼尾，鱼尾下注“欧文卷×”及页数，还有刊工姓名。卷中有双行小字校语，但卷末并无校勘题名与校勘记等。此本虽为《居士集》五十卷，而实际是按照一个一五三卷的明刻本，抽出一集加以翻刻的，就其行款来看，远源仍是宋庆元本。

②还有一个特殊的本子，是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当清乾隆甲申二十九年）皇都御书馆刻本，名《欧阳文忠公文集》，只有三十六卷，但其实是《居士集》的翻版。平安人岛靖之（字定国）家藏欧集两本，其一为元刻本，他请皆川愿（字伯恭）和清绚（字君锦）以两本互正讹误，加句读校讎，捐资募工，历时二年方告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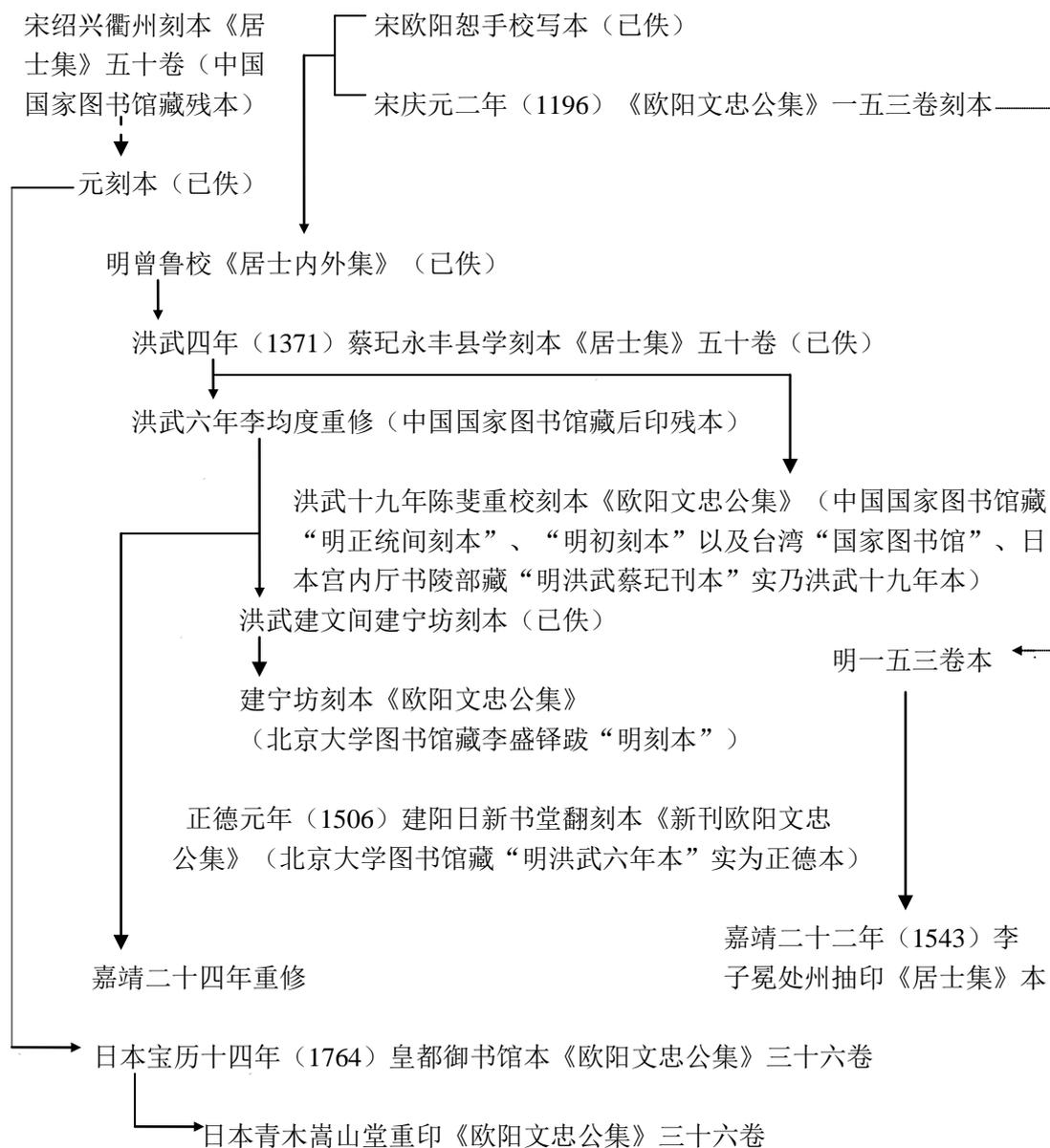
这个本子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未言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首有宝历辛巳（十一年，1761）清绚《刻欧阳文忠公文集序》、宝历十三年皆川愿《刻欧阳文忠公集序》、苏轼《欧阳文忠公文集序》、《欧阳公文集目录》。正文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书口上端注“欧阳公文集”，中注卷页；正文中有小字校记，天头还多刻有校语，卷尾都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绍熙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两行宋人题名，且附校勘记。末有“癸未春正月”（宝历十三年）岛靖之《刻六一居士集跋》，还有一块牌记“宝历十四年甲申岁三月吉日刊行，皇都御书馆，二条通富小路东入町，吉田四郎右卫门，后编嗣出。”从该本序跋以及各卷卷尾的宋人题名可以看出，它是据一元刻本的《居士集》刊刻的；该本卷一赋至三六祭文，实见于《居士集》卷一五至五〇，且各体文数量编次不变，所以这个本子是将《居士集》去掉前面十四卷的诗，只收后面三十六卷的文而成的，故仍应归属《居士集》五十卷系统。因为是日本刻本，所以正文旁边多刻有和式训点。

③另外，同样是三十六卷《欧阳文忠公文集》，上海图书馆收藏有“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青木嵩山堂刻本”。其书名页镌“苏东坡先生撰、皆川淇园先生辑，欧阳文忠公文集，浪华、青木嵩山堂梓”，所谓“苏东坡先生撰”，大概是指苏轼撰写了《居士集》序而言。该本卷首先皆川愿序，后清绚序，其余内容行款全同前宝历十四年皇都御书馆本；卷末还有一块新牌记，注明出版、发行、销售者及地点，“和汉洋书籍出版社，发行者大阪市……青木恒三郎，制本发卖所大阪市……嵩山堂本店、东京市……嵩山堂支店、伊势国……嵩山

堂分店”。按：此当为青木嵩山堂得宝历十四年皇都御书馆旧版后加以重印之本，并非新刻，书名页中“苏东坡先生撰、皆川淇园先生辑……青木嵩山堂梓”云云，皆夸张宣传之辞，其出版年代极可能晚至近代。上海图书馆著录为“日本宝历十三年青木嵩山堂刻本”，显然是涉宝历十三年清绚序、岛靖之跋而误断。

日本版本中又有只收欧阳修诗集的，如《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四川省图书馆藏《六一居士诗集》二十一卷铅印本（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谓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无），亦出青木嵩山堂，时间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当清宣统三年）。故上海图书馆所藏青木嵩山堂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可能也出于同时。

单刻《居士集》五十卷系统的各本源流简括如下：



（注：此节吸收谷建等同学所作考证。）

其他系统

一三五卷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奉使江藩行人司行人铜仁（今属贵州）陈珊（字鸣仲），在江西左、右布政使汪宗元、潘恩的提议之下，取吉安旧刻一五三卷、《附录》六卷删重订讹，重新分门别类，校刻了《欧阳文忠公全集》，成一三五卷，这是一个与以往所有的欧集完全不同的本子，它不再将欧阳修诗文分作10个各自独立的小集，而是全部打乱，按体重编，连欧阳修晚年亲自修订的《居士集》的原貌也毫不保留。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个本子的面貌如何。

该本首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陈珊《重校刊欧阳文忠公全集序》、钱溥及彭勛《欧阳文忠公全集序》、周必大跋、《六一先生小影》及像赞、《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全集总目》，其《总目》标明类日和数量，具体分为：卷一谱（含《族谱图》及《年谱》），二应制近体赋、杂著，三赋、杂文，四至一五古诗，一六乐府、古诗，一七至二四律诗，二五致语、诗余，二六诗余，二七论、或问、解，二八论，二九论、杂文，三〇、三一策问，三二经旨、论辨问，三三易童子问，三四崇文总目，三五上皇帝书，三六、三七濮议，三八奏对论议，三九、四〇表状劄子，四一奏表劄子，四二、四三劄子表状，四四至五七奏议，五八、五九河东奉使奏草，六〇、六一河北奉使奏草，六二至六四序，六五序、传，六六序、说，六七序，六八至七〇记，七一行状，七二至七五墓志，七六、七七墓志、碣，七八至八四墓志，八五至八七碑铭，八八碑铭、赞，八九、九〇墓表，九一、九二祭文，九三至九六书，九七启，九八书启，九九至一〇八简，一〇九跋，一一〇至一一八集古录跋，一一九、一二〇归田录，一二一诗话，一二二笔说，一二三谱，一二四志记杂记，一二五诏册杂制，一二六外制敕诏，一二七、一二八制，一二九制敕口宣，一三〇制敕口宣诏文，一三一斋文词疏，一三二赐外夷诏书口宣，一三三制词谥诰，一三四附录墓志铭、神道铭、祭文，一三五附录本传、事迹。正文半页10行行20字，左右双边，白口，白鱼尾下标“欧文忠公族谱卷一”、“欧文忠公全集卷二”等及页码，书口下端还有写样及刊工姓名，如“况用写，姜培刊”，每卷卷前皆出该卷细目。卷一三五后有《累朝校刊欧阳文忠公全集名氏》，开列了宋绍熙、庆元间孙谦益等初刊12人至明程宗、顾福、刘乔、季本历次重刊人名，又在“按”语中附列了此次和陈珊共同参与校勘、督办的罗良、汪宗元、潘恩等人员，最后还有嘉靖三十四年陈珊所撰《累朝校正诸名氏跋尾》。就陈珊前后序跋来看，此次重新编刻所依底本“吉刻”，是从明天顺五年（1461）、弘治四年（1491）、正德七年（1512）、嘉靖二十六年一脉相承下来的始终在吉安府重修重刻的本子，它也许是程宗本，也许是季本本，也许不止一本。

这个嘉靖三十四年（1555）陈珊一三五卷本，到万历元年（1573）有重修，主持者乃当时的吉安知府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人雷以仁，卷末有雷以仁跋，今社科院等处有收藏。

一三〇卷

欧阳修是庐陵人，故在庐陵一地刊刻的《欧阳文忠公全集》最为流行。不过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金陵出现了一个新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三〇卷、《附录》四卷，卷数也显得与庐陵诸刻不一样。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缺卷六九，《附录》卷四止于页四二，下不完。起首书名页大字“镌欧阳文忠公先生全集”，中间还有一行小字“金陵光启堂督刊”；有万历四十年（1612）湖广布政司参政兼按察司佥事樵李（今浙江嘉兴市南）人陈于玉《重刻欧阳文忠公集序》、苏轼《六一居士集序》、万历四十三年临汝（今属河南）姜肇昌（字楨熙、号狝卿）《重刻欧阳文忠公集序》；《欧阳文忠公集目录》计12卷，乃卷一至一三〇之细目，将欧阳修诗

文分为赋、近体赋、骚体、琴操、颂、赞、章、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长短句、上书、疏、劄子、状、表、诏、敕、制、批答、口宣、册、国书、表、青词、密词、右语、册文、斋文、祝文、祭文、上梁文、祝祷文、论、试论、或问、解、辩、试策、策问、序、记、传、书、启状、碑铭、墓志铭、墓碣铭、椁铭、墓表、行状、谥议、祭文、杂著（包括易童子问、濮议、集古录目、奏事录、归田录、诗话、笔说、射格、砚谱、洛阳牡丹记、于役志）各体。正文半页 10 行行 20 字，四周单边，书口上端标“欧阳文忠公集”，单黑鱼尾下为卷页；仅卷一首有题名 3 行“庐陵永叔欧阳修著，古临楨熙姜肇昌校，绣谷荆岑王凤翔刊”。《附录》为四卷：卷一本传、事迹，且卷首有“古临楨熙姜肇昌校订”一行题名；卷二年谱；卷三（宋庆元本）编定校正题名、周必大跋、旧本（一五三卷、《附录》五卷）总目；卷四杂考证，有小字注曰“凡系旧本者直注其下，新添者则以今按别之”，页四二以下缺。

就陈于玉《序》、姜肇昌《序》及校勘题名来考察，似是万历四十年（1612）陈于玉据庐陵旧本重加编校，厘成一三〇卷的，当时陈于玉“奉敕分巡武昌道”，则刻本应出于武昌。万历四十三年姜肇昌遇“坊人持永叔集”，请他校订，遂任其职，则这个“坊人”当为刊刻者金陵光启堂主王凤翔，姜肇昌校订的底本当系陈于玉刻本。

《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著录有万历四十年（1612）陈于玉刻本，仅藏南京图书馆，未及见；又将“万历四十三年金陵光启堂刻本”与“万历四十三年王凤翔刻本”分作两种著录，前者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者藏南京图书馆和日本大谷大学。这 3 种本子都是一三〇卷、《附录》四卷，内容是一样的，后两种更是同一本子，只是各图书馆目录著录上写法不同而已。

一〇五卷

清康熙十一年（1672）庐陵人曾弘（号旅庵）以八十一岁高龄，购善本独力重镌《欧阳文忠公集》一〇五卷，并遍请名流题序，如吉安知府郭景昌、临江知军王抚民、南昌知府周士璿、南康知府廖文英、吉水知县王雅、庐陵知县卢弘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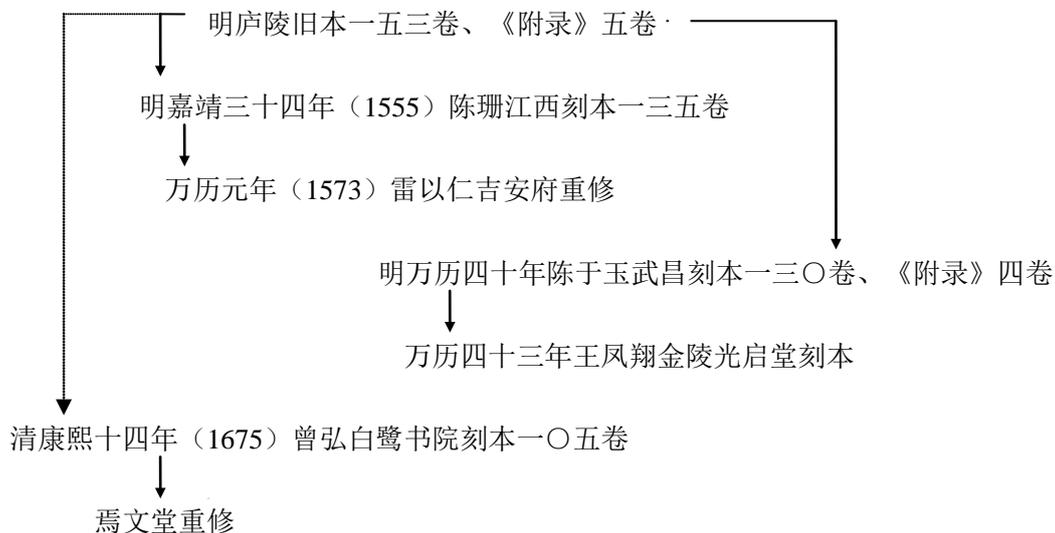
今见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十二年（1673）曾弘白鹭书院本”，扉页有嘉庆十八年（1813）“汲波舫”（即王芑孙）题记。卷首清人序极多，计有郭景昌、王抚民、姚启盛、甘国栋、王雅、房廷祜、周士璿、杨大鲲、廖文英、卢弘孝、李道泰、黎元宽、张贞生、李振裕、曾弘共 15 人，它们大多题于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最晚的一篇为卢弘孝《重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叙》，题于康熙十四年春正月；而曾弘本人“书于白鹭书院”的《小引》成于康熙十一年，文中称刊刻告竣。后又有两篇《欧集序》，是欧阳修作于庆历五年（1045）三月二十一日和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日的自序，核其文字，原来即是《外制集序》和《内制集序》。之后为明天顺六年（1462）钱溥序、《六一先生遗像》、《欧阳文忠公全集目录》（细目）、《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带胡柯后记）。正文半页 10 行行 20 字，四周单边；每卷卷首都有“吉水后学曾弘重梓”题名，从卷一至二五，卷首尾署“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卷之×”，书口上端注“居士集”，单黑鱼尾下端注卷页及刻字字数，卷末有“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题名一行；从卷二六至一〇五，卷首则署“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之×”，书口上端改注“欧集”，卷末亦注“欧集卷之×终”。就全书一〇五卷收录的内容看，前二十九卷皆出自《居士集》（虽然书中仅在卷一至二五注出“居士集”），但是没有收诏册、神道碑铭、墓表、墓志铭、行状等文；卷三〇起为《外集》的内容，但先文后诗，次序有异，也没收全；卷四七起收内制，卷五五起收外制；卷五八至六二又有记、序、传、近体赋、论，仍出《外集》；卷六三起为易童子问，卷六六起为乐语、长短句；卷六九起为劄子、表、状、启，实出《表奏疏启四六集》；卷七七起收劄子，俱出《奏议集》；卷九九起为濮议；卷一〇三为

易类，卷一〇四为归田录，卷一〇五为事迹。可以说此本的编录实取自旧本各集，但又不完整，还打乱旧次，既非分体，亦非编年，显得杂乱无章。曾弘以一己之力重刊欧集，本值得赞许，但恐怕底本不佳、校勘不力、编次主观随意，结果这个本子虽号为“全集”，其实不全，刊刻质量不足称道。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当系康熙十一年时基本刊成，曾弘又请众人题序，故于十四年时才将诸序刻完。

又见浙江图书馆所藏之本，著录作“清康熙十一年焉文堂重刊本”。其书名页题“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焉文堂重梓”，开卷即为康熙十一年（1672）曾弘《小引》，次郭景昌《重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叙》、房廷祯《欧阳六一居士全集序》、张贞生《重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叙》，省却了其余诸人冗序；保留了两篇《欧集序》，无钱溥序；《六一先生遗像》次《目录》后、《年谱》前。正文行款、题名、内容、编次几同前上海图书馆藏曾弘刻本，只是卷四以后“熙宁五年秋七月男发等编定”题名一行或被挖板或被撕去，不再出现，而从卷二六至一〇五书口变成单白鱼尾这两点有异，另外还有字迹模糊和断版现象。分析来看，此本当系取康熙十四年曾弘白鹭书院旧版修版重印之本，挖版痕迹以及由黑鱼尾变成白鱼尾就是明证，只是不知焉文堂重印的具体年代。浙江图书馆因该本卷首诸序都作于康熙十一年，故而为断，实际上是重印时省去了晚出之序文，所以应当定为“康熙十四年曾弘原刻，焉文堂重修本”。

这里可以纠正《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两个错误：它著录的浙江图书馆“清康熙十一年（1672）焉文堂重刊本”为“一五三卷、《附录》五卷、《目录》一卷”，实际是一〇五卷，卷一〇五所收事迹原本属《附录》的内容，但并未单列；而且该本是康熙十四年曾弘原刻，后由焉文堂补版重印的。另外它又著录了上海、江西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分别藏有“清康熙十二年曾弘白露书院刻本”《欧阳文忠公居士集》一〇五卷、附年谱一卷，“十二年”当作十四年，“露”当作鹭。

上述一三五卷、一三〇卷、一〇五卷本其实都是明清人据通行的明庐陵旧本一五三卷重新编刻而成的，而它们相互之间却并无直接的联系，其关系如图所示：



选集、词集

欧阳修诗文创作丰富，在宋代当时也是比较突出的，其全集多达一五三卷，且历代流行不衰。除此而外，人们编刻的选集也不少，如《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欧阳文忠公诗

集》六卷、又十二卷、《六一居士诗集》二十一卷、《欧阳文忠公文抄》十卷、《欧阳文选》二卷、《音注欧阳永叔文》一卷、《欧阳文忠公尺牍》四卷、《欧阳文忠诗抄》一卷、《欧阳文忠诗补抄》一卷、《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抄》三十二卷、《欧阳修诗文选注》、《欧阳修文选》、《欧阳修诗选》等等，从宋代到现代，竟有数十种之多，这里我们只介绍几种。

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陈亮选编了《欧阳文忠公文粹》，他从欧阳修全集当中“掇其通于时文者”130篇，“以与朋友共之”，并撰后叙一篇。就其数量看，还不到全集的十分之一二，但是其文字却往往与通行的全集不同，而且有溢出全集之外的篇章，如《原正统论》、《明正统论》两篇就不见于《居士集》。陈亮编选的《文粹》影响不小，后世多有翻刻，而且至今尚有宋刻存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欧阳先生文粹》五卷、《拾遗》一卷，前有苏轼《居士集序》，次为苏轼、王安石、曾巩等《祭欧阳文忠公文》；《目录》前缺二页，末附陈亮后序，还有《拾遗》细目。正文半页14行行26字，四周双边，白口，两个向下的黑鱼尾，书口中间注“欧文×”，下端有页码和刻工姓名或字数。卷一首有“铁琴铜剑楼”印，收论、辨、策问，卷二书，卷三劄子、奏状、杂著、集古录跋尾，卷四序、记，卷五碑铭、墓表。末尚有《欧阳先生文粹拾遗》一卷，收《丰乐亭记》、《明妃曲和王介甫》等11篇诗文，后钤“绶珊经眼”等印。

由陈亮编选的《文粹》，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云鹏宝善堂刻本二十卷是后世流传较广的本子，而且还带有郭氏所辑《遗粹》十卷。其卷首较宋刻本多了《本传》、《神道碑》和《墓志铭》；《欧阳先生文粹标目》虽细分为二十卷，但实际所收各体文的类别、数量及序次与宋刻五卷本是一致的。正文行款为半页11行行21字，左右双边，白口，单白鱼尾，书口中间标“欧阳文粹卷×”及页码，下有刊工名；卷末有陈亮后序。后接《欧阳先生遗粹标目》，卷一赋、论，卷二书，卷三劄子，卷四奏疏、奏状，卷五序，卷六记，卷七传、杂著，卷八碑铭，卷九墓铭，卷一〇墓铭、墓表、祭文、诗；正文书口处改注“欧阳遗粹卷×”。此本有三块牌记，一在卷二〇末尾作“吴郭云鹏校勘梓行”，一在陈亮序后作“吴会郭云鹏校勘刻于宝善堂”，另一在全书末尾作“吴郭云鹏选辑附（付）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康熙八年（1669）湘灵先生钱陆灿批点并跋，以及宣统元年（1909）邓邦述手跋。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有藏本，但仅有《文粹》部分而无《遗粹》十卷。

清乾隆《四库全书》中所收的亦是二十卷，名《欧阳文粹》，末亦有陈亮后序。

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茅坤（1512—1601），号鹿门，古文家，曾编辑评点过《唐宋八大家文抄》，有万历七年（1579）刊本，其中《欧阳文忠公文抄》为三十二卷，收上书、疏、劄子、状、表、启、书、论、序、传、记、神道碑铭、墓志铭、墓表、祭文、行状、颂赋杂著共计279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首有茅坤《欧阳文忠公文抄引》、《欧阳文忠公本传》、《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抄目录》；正文半页9行行20字，四周单边，单白鱼尾；每卷卷首都有两行题名“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但卷五等第二行题名却更改为“孙男闇叔著重订”；正文中间多有圈点，天头有小字批语。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卡片仅著录为“明刻本”，实是万历七年刻本《八大家文抄》之零种。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其诗文被广为传诵，全集一五三卷由宋至今不断被校勘重刻，基本没有什么散逸情况发生，但是集外佚作并非绝无仅有，只是搜集它们要花费较大的筛汰精力，可谓披沙拣金。今天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欧阳修》，除了见于本集的诗作二十一卷外，又在第二十二卷中收录了辑自《锦绣万花谷》等其他书之佚诗5首及残句13则。四川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宋文》也收集了佚文49篇，按体编入相应卷中，统成一〇一卷。目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正在编纂《〈全宋诗〉补正》，我们又考辑出欧阳修佚诗14首、残句6则。综合以上几部分，则欧阳修诗文作品差可告“全”。

欧阳修的词集，在宋代有《六一词》一卷、《平山词》等，今天流传下来的词集书名、

卷数也不统一：《醉翁琴趣外篇》六卷，有影宋刊本，见《影刊宋金元明词四十种》；《近体乐府》三卷，见宋庆元本《欧阳文忠公集》等；《六一词》，明毛晋汲古阁《宋名家词》本为一卷，而明吴讷辑《百家词》本则为四卷、附《乐语》一卷等。今人也已为欧词作笺注，如黄畬《欧阳修词笺注》，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

另外，值得称奇的是今天仍流传有九百多年前欧阳修亲笔所书的诗文真迹，保藏在辽宁省博物馆，1959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以珂罗版影印出版，题名为《宋欧阳修诗文手稿》，使天下之人得以共同欣赏这位一代文豪的手迹书法。

（原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收入《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今增改修订）